

# 赵聪 民乐“出圈”离不开守正创新

文 余珏

赵聪代表着当今中国琵琶演奏的最高水平。她出访过欧洲、美洲、亚洲、大洋洲的50多个国家及地区,曾获文化和旅游部“海外推广个人贡献奖”。她以弘扬中国民族音乐为己任,致力于琵琶艺术在全世界的推广,被誉为“音乐外交官”。琵琶带给她的远不止获奖与荣誉,这件古老的乐器在她指尖下成为“神器”,一个个音符以独特的韵味游走于天地之间,弦上所指,即为心中所悟。接受专访时她说:“音乐是特殊的语言,很容易通过音乐与他人沟通;音乐也更容易激发人的情感,在音乐的碰撞中,人与人的距离也被拉近了。”

今年5月,“最美时光——赵聪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”在天津大剧院上演,琵琶与钢琴等乐器合奏共鸣,给天津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视听享受。赵聪表示:“我们所做的这些尝试,是要打破传统音乐的边界,让琵琶在传承传统精髓的同时,吸收全球音乐文化的营养,形成独特而多样化的音乐风格,让中国民族音乐在现代生活焕发生机,展现出全新的意境。”

近年来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大家喜爱。身为中央民族乐团团长,赵聪为此竭尽全力,她希望能在兼容并蓄中传承经典,推进文化自信自强,让中国民族音乐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。

借鉴西方音乐和声节奏  
诠释东方音乐韵味之美

赵聪生在音乐之家,自幼显现出音乐天赋,6岁时她主动对妈妈说:“我要学琵琶。”琵琶是较难掌握的乐器之一,音域广、指法也特别复杂。为了教女儿学琴,妈妈孙朵萍办了一个艺术班,招收了十名学生。赵聪回忆:“在班上她让我喊妈妈,而要喊老师;她总表扬别的孩子,却几乎不表扬我。我很着急,但也激起了练好琵琶的决心。有一次我练了十个小时,感觉头晕目眩,甚至有点儿发烧,但心里特别高兴。”

在吉林艺术学院附中上学时,赵聪遇到了一位好老师——琵琶教育家、演奏家孙树林老师。“孙老师对音乐的要求非常苛刻,为了一个音,能上几个小时的课,一定要找到最传统、最正宗的那个味道才行。”但是赵聪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,她说,在学琴路上自己完全是心甘情愿,没有任何人强迫她一定要怎样。

1996年,赵聪如愿考入中央音乐学院,师从琵琶教育家、演奏家李光华教授。“李老师善于因材施教,可以说,我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老师。”她深深地爱上了琵琶,爱上了中国民族音乐。2000年,赵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,在业务资格考评中获得第一名,顺利考入中央民族乐团。

“刚从学校毕业时,我只会演奏传统作品,不会弹别的作品。”随着眼界日渐开阔,赵聪想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的人认知、喜爱,她试着借鉴交响乐、电子音乐、流行音乐的特点,让中

赵聪

中央民族乐团团长,首席琵琶演奏家。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,获全国青年专业琵琶大赛一等奖、美国圣荷西国际乐器大赛金奖。出版专辑《聆听中国·月舞》《琵琶新语》等。



赵聪(右)在天津大剧院演出。《天津日报》资料照片 姚文生 摄

国民族音乐变得更加丰满,现代。国外有一个音乐组合“古典辣妹”,赵聪和几个同学也组成了“music cat(音乐猫)”组合,既有小提琴、大提琴等西洋乐器,也有琵琶等民族乐器,形成了一种丰富、有趣的世界音乐语言。“琵琶和吉他有许多相似之处,既然有电吉他,那琵琶也可以插电啊!中国民族音乐不能给人留下刻板印象,我们也可以很时尚。”赵聪找人定制了一把能站着弹的电琵琶,演奏起来激情四射,她也像弹吉他一样,在舞台上跑来跑去。

可以看出,赵聪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“乖孩子”,求新、创新在她的艺术理念中是永恒的命题。当然她也很清楚,舞台不是个人的秀场,观众的需求是最重要的。她不想颠覆传统,而是要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东方音乐之美。“中国民族音乐和声较少,更讲究旋律与韵味,这种表达方式不太容易被西方人理解,但如果我们把西方音乐的和声、节奏借鉴过来,同时又不缺失自己的韵味、旋律,那么西方听众就更容易接受东方的音乐。只有找到融会贯通的东西,情感才能产生共鸣。”

《十面埋伏》是赵聪自七八岁起就能熟练演奏的古曲,后来她与作曲家马久越合作新编,用电子音乐伴奏,配合强劲的鼓点,弹奏出古风新意,令乐坛耳目一新。她也曾改编过经典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,全家人一起演奏,琵琶的清脆、钢琴的悦耳、小提琴的柔美交相辉映,少了些许悲壮凄婉,多了几分温馨情愫,感染力十足。赵聪与家人彼此间眼神有爱意的互动,也让现场充满了家庭温馨的气氛和爱意。

在赵聪的创意中,东西方乐器寻找着共同的语言,进行着多元化的组合。她也逐渐领悟到:新民乐不仅仅是民乐加电子音乐,不是用琵琶、二胡演奏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,更不是将咖啡与茶搅在一起的“咖啡茶”。演奏中,琵琶与提琴、爵士钢琴互相交错,要让琵琶的个性语汇与西方乐队的气氛积极互动,和谐相生,不落俗套,这才是完美的融合。

她主导创作的乐曲《玫瑰探戈》,以琵琶的独特魅力搭配西方乐器的风情,让音乐“狂嗨”

不已。中央民族乐团、故宫博物院与芝加哥交响乐团打造的“天地永乐·中国节”,以“云合作”的方式打破音乐界限,让民乐飞到更远的地方,掀起一股中国文化的浪潮。琵琶与钢琴、弦乐四重奏等相互交融,形成全新的表达,刷新了大众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认知。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,包容性很强,我们可以用琵琶演奏各种风格的音乐,能文能武,可以西方,也可以东方。琵琶古曲意境高远,而当它与流行音乐、电声结合在一起时,也不会有违和感。”赵聪说。

将“反弹琵琶”变为现实  
创作元宇宙音乐《三星堆·神鸟》

2014年,受中央民族乐团委约,赵聪创作琵琶协奏曲《丝路飞天》。她到敦煌莫高窟采风,发现跟自己想象中的并不一样,“毕竟经过了上千年的时光,洞内黑暗、斑驳,似乎什么都没有。而就在亮起的那一瞬间,我感受到了敦煌壁画的伟大,似乎穿越了时空,在与古人对话。”她的脑海中时时浮现出这样的画面:“一个一个的飞天女子鲜活起来,我闭上双眼,任由旋律和灵感来找我,然后把它们记录下来。”她在作品中运用了琵琶经典指法,还创新了演奏技法,并在和声结构、节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。

琵琶协奏曲《丝路飞天》作为纪念敦煌1650年特别演出,在敦煌九层楼前首次呈现。敦煌几乎不怎么下雨,而当天赵聪演奏时,竟下起了绵绵细雨。此情此景,令在场的敦煌研究专家樊锦诗不禁感叹:“这是感动了天女,天女散花了。”琵琶的弦音在空灵中流转,如水流般纤细婉转,又形成了浩然之势,营造出神秘而激动人心的历史幻境,仿佛有一双手持琵琶的飞天女子,踩着五色祥云,从遥远的古代穿越而来……赵聪也不知不觉泪如雨下。

创作为赵聪打开了另一扇门。“和西洋音乐相比,中国民族音乐的曲目太少了。我想写

的不是那种简单的曲子,而是希望其中有中国文化的厚重体现。我一天作曲都没学过,我写的都是我真切的感受,是能给我特别大冲击力的东西,我用音乐的方式把自己的画面感写出来。”赵聪说,很多曲子凝结了自己的心血,只希望能为琵琶演奏多留下一些作品。

在敦煌壁画中,琵琶出现过600多次,手持琵琶、边弹边舞的绘画也有数十幅,怀抱竖弹、挥臂横弹、昂首斜弹、倾身倒弹、背后反弹……可谓姿态万千。壁画中有一位反弹琵琶的天国舞伎,头束高髻,琵琶置于脑后,双臂在斜上方反握而弹,踏足而舞,二目微垂,神态自若。反弹琵琶,实际上是边奏乐边舞蹈,是大唐文化永恒的符号之一。由于琵琶自身的重量和演奏者能力的局限,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反弹琵琶,往往只是舞蹈造型。而在2022年央视元宵晚会上,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共同演绎《齐天乐》,赵聪反弹琵琶缓缓转身,一曲梦回敦煌,画中人鲜活地展现于世人面前,“曲仙场景”让观众大开眼界。

为了尝试反弹琵琶,赵聪坚持练瑜伽数月,通过站立、开肩等动作训练,她的手臂越来越柔韧,终于可以反手运用滑弦、轮指等技法。她联系上海敦煌民族乐器厂,根据敦煌壁画复原制作了四把琵琶,不断改进音色、形制、外观、大小、重量。在服装设计师的巧妙设计中,她找到了反弹的支点,把不可能一步步变成可能,最终技惊四座。

当许多学者在对古代“诗、乐、舞”一体的表演形式进行破解与追溯之时,赵聪以实践回应了人们的疑问,让“反弹琵琶”走出了壁画。乐器都是有生命的,她用声音滋养着它,探求着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深度。

三星堆遗址以历史久远、文物精美、文化独特、神秘莫测而引起世人的瞩目。2021年,第一次走进三星堆博物馆,赵聪便被千姿百态的文物深深吸引。“究竟是怎样的一段历史,留下了如此造型奇特、意蕴丰富的物件?古蜀国的谜题太多,赋予了我们庞大的探索空间,也激发着我们无尽的想象。”她萌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,在她看来,历史与想象之间的留白,正是创作者和演奏者可以发挥、值得发挥的地带。

在三星堆博物馆专家的指导下,赵聪成功创作了首部元宇宙概念音乐作品《三星堆·神鸟》。作品以“三星堆文化×国乐艺术×元宇宙概念音乐”的多元表达形式,将数千年前的神秘与浪漫、数千年后的时尚与炫酷交织缠绕在一起,呈现出三星堆穿越时空的魅力。琵琶以外的音色全部用数字化方式制作,传统乐器在创新中焕发新声,古老的浪漫与当代的时尚交织缠绕,创造出不一样的中国声音。

心中有创新的种子  
脚下有传统的根

2021年,赵聪出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。她是中央民族乐团建团以来最年轻的女性掌门人。从琵琶演奏家到一团之长,除了艺术创作之外,她还要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思考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。上任之初,她借用电影《夺冠》中的一句对白描述自己的心情:“从此以后,中央民族乐团没有你,没有我,只有我们。”

讲述

## “赢在起跑线上”和“美好的童年”孰轻孰重? 回归育人的本心

口述 石一枫 整理 何玉新

“在教育内卷浪潮下如何做个逍遥仙儿——石一枫《逍遥仙儿》新书发布会”近日在北京举办。作家张煜然、评论家刘苏娟、北京四中教师吴丹丹与石一枫围绕《逍遥仙儿》解读当代教育现状,活动现场气氛热烈,近23万人次通过直播平台观看,引发广泛关注。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,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《入魂枪》《心灵外史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百花文学奖等奖项。

这是一个被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——“赢在起跑线上”和“美好的童年”,二者孰轻孰重?如何才能回归育人的本心?是否应该返璞归真,活成“逍遥仙儿”的理想状态?《逍遥仙儿》围绕三个家庭的育儿征途,呈现出各家的欢喜哀愁,勾连出当下社会众生相。

母亲的全部精力  
都用在了孩子身上

作为“80后”,我应该算是最后一代比较“放养”的孩子。小时候上的一般小学,老师的主要任务不是让我们进步,而是让我们不犯错误、平

平安安就行了。我没上过什么补习班,没有各种极度焦虑的情绪,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放了学满院子疯跑、撒野,跟家长斗智斗勇。

能考上北京大学,我觉得自己占了两个便宜:一个是北京的孩子考北京大学比其他地方的孩子容易多了。我大学本科报到的时候,发现同宿舍山东的、浙江的同学都差不多比我高出100分。还有一个原因,我属于极度偏科。我小时候碰到过不少极度偏科的同学,我家附近有个地方叫高能物理研究所,我上初中时有一个同学,是那个研究所的子弟,他爸是科学家,研究对撞机的。我是语文、历史不用学,他是数理化学不用学。我天天学数理化,跟他比也差很多;他天天念语文,也不如我。后来他也上了北大,在学校里第一次碰面,他说你是中文系的吗?我说你是物理系的吧?我们都猜对了。

卷不卷,痛苦不痛苦,有时候真的在于你是自愿还是被胁迫。过去北京有一句粗话,叫“吃屎都掐尖儿”,就是形容这个人争强好胜。所以只要是自愿,干什么事都会高兴。

带孩子这件事,基本上会让一位母亲投入五六年甚至十几二十年,全部都是孩子,其他什么都不顾了。孩子的健康,生活就不用说了,教育,

牵扯到母亲几乎全部的精力。甚至于,作为一位母亲,成功不成功,就看你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。

我是孩子的爸,虽然爸爸一般都是说风凉话,或者看热闹的那种,但总得参与。刚开始带着我们家孩子上各种班的时候,孩子只有两岁多,班经常倒闭,孩子妈妈去报另外一个班,我就等着退钱。我记得有一个在商场里办的班倒闭了,一个人抱着什么东西跑出来,我以为他是经理,拦住之后才闹明白,原来他也是家长,懒得退钱,把电脑给抱走了。我觉得很神奇,我就想,将来有可能会写一个跟小朋友教育有关的小说。

在卷得很厉害的姿态里放松一下  
也是能让人欣慰、愉悦的事

我找到了一个既有价值,自己又特别熟悉的题材。这是生活赐予一个作家的经历,有了这样的经历,写出了这样的小说,是一种幸运。在《逍遥仙儿》中,随着日益狂热的“鸡娃”浪潮,“双减”政策一朝施行,校外培训班、课外辅导班纷纷关闭。“牛小”的家人们打起“地下战争”,三个家庭选择了不同的方向……

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位观察者的,他的身份是纪录片导演,是一个拿着

摄像机的人。他在记录,用他的视角引导大家看一部关于教育的影片或故事。这个故事的男主角是两位女性,两位母亲——王大连与苏雅纹。她们的人生截然不同,但是教育这件事,恰恰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走同样的路,追求同样的东西,上同样的辅导班,请同样的老师,她们一定要把自己和孩子按在一个模子里。可能开始我对苏雅纹有一种淡淡的嘲讽,但随着故事的发展,我也会理解这样一位女性,理解她的生活态度。

我想在书中表达的一点是:人有很多的向度,经济向度、文化向度、性别向度……过去被我们忽视的向度,现在好像变成了一个火药桶。比如经济向度,搁在改革开放之前,谁家穷点儿、谁家富点儿,都无所谓,相对来说还是一样过日子。但是现在,家庭的经济状况变成了一个敏感的火药桶。人在各种向度之间游走,像是在地雷阵中穿梭。写着写着我就觉得,我们这代人都到了为人父母的年龄了,怎么活得越来越难了?

一般来说,小说是要解决问题的,但为什么说《红楼梦》高级,就是因为它探索的问题是解不开的,就连贾宝玉到底跟谁结的婚我们都不知道。这种矛盾在现代小说中时有出现,因为现代小说强调追寻,可能提出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,所谓小说技术,更多地体现在这个层面。

《逍遥仙儿》的解决方式,是我们暂时跳出来,或者以某种意义上的失败告终:苏雅纹的“鸡娃”道路未遂;王大连想变成一个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都备受尊敬的人,未遂;包括男主人公,想摆脱空虚和无聊,也未遂……生活总是处在失望和未遂的状态下,我觉得倒是比较通透。不过,写到孩

子的时候,我的心还是比较软,愿意把他们写得比较幸福。小说的结尾,落在一个让人感到慰藉的地方,人人和人最终会找到相同的部分,彼此认同,彼此谅解,在经历了自我体认、自我确证的挣扎之后,发现了返璞归真的温情。如何做逍遥仙儿?在书里可能没有答案,但看完之后,至少可以让我们在卷得很厉害的姿态里稍微放松一下,这也是一件让人欣慰、愉悦的事。

文学不是励志格言,也不是警示语言,很难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。但文学特别重要的一点,就是它书写了生命的过程,它让我们思考,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寻找自己的答案。



作家石一枫

坚持平民视角  
每部作品都要突破自己

这些年我写过几部小说,一直坚持平民视角,好像没有变化的余地。因为如果把平民视角换成所谓的“贵族视角”,人家也不需要我们啊,而这种相对平民的视角,我觉得是一种文学的骨气,该有这种骨气,该有就有。

我的状态也不一定对,可能是我的思想境界不够高,我觉得我是在不断地退守。那些宏大的词汇,或者特别现

传统与创新,一直烙印于中国民族音乐的艺术基因里,也贯穿在中央民族乐团的发展历程中。赵聪深受这种氛围的熏陶,她说:“中央民族乐团注重传统,也乐于拥抱新鲜事物。中国民族音乐的‘出圈’离不开守正创新,第一步是守正,我们从来没有向优秀的艺术传统汲取营养,传统与创新不可能割裂,万物有所生,而独知守其根,心中有创新的种子,脚下有传统的根,才能长成参天大树。”

中国民族音乐有着厚重的传统,但在一些年轻人眼里,其中一些内容过于高深,很难接近。对此赵聪并不否认,她说:“确实有距离,所以我们要俯下身去聆听年轻人的反馈,看看他们喜欢什么,用他们喜欢的方式结合我们的音乐,再去打动他们,引领年轻人进入更广阔、更深层的中国文化空间。”他们策划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“国乐之春”艺术节,搭建文化平台,让中国民族音乐实现跨界演出。“许多好玩的东西混搭在一起,就像做菜,不一定是传统的锅包肉或者宫保鸡丁,有可能是全新的东西,是创意菜、融合菜。或者有一些特殊的音效和声乐,或者更立体,或者有沉浸感,我们就是想打破传统的音响概念,形成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,在兼容并蓄中流传下去。”

赵聪也是把中国民族音乐推向世界的“音乐大使”。她说:“音乐没有国界,音乐本身跨越了语言障碍,我们的民族音乐不仅极具自身特色,在世界民族音乐大家庭里也是领先的、优秀的。未来,我们乐团会一边继承传统、打磨国曲,一边继续拓展民族音乐的现代化表达手段。”

“弹指之间穿越古今,无问东西自在无边。”这是赵聪的座右铭,前半句契合了她作为琵琶演奏家的艺术向往,后半句则代表了推广中国民族音乐的鲜明理念。

有人形容赵聪“人琴合一”,对她而言,这不仅是演奏的境界,也是人生的宿命。“琵琶对我来说是身体的一部分,是生命的延续。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江湖,赵聪的江湖,就在琵琶的四根弦上,一挑一捻,用尽了一生的力气。

如今她仍然坚持每天练琴,每晚9点以后,是她与琵琶的独处时间。办公室里也有一把琵琶,工作之余弹弹琴缓解压力,即便外出开会,她也要带上琵琶。对她来说,练琴是最有安全感、最幸福的事。那么,现在登台演出时,还会有压力吗?她回答:“音乐本身不会给你压力,但是,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此,你的演出又代表着中国民族音乐,你必然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。所以要把杂念都去掉,回归本真,这段经历就会成为你的人生财富。”

赵聪也承认,所有的乐器大师、一代宗师几乎是男性。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比较执着,一直在坚守;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同时具备了男性的爆发力和女性的细腻。在艺术上,细腻和爆发力需要兼顾,所以演奏家在演奏时,最好忘掉自己的性别。关键看你有没有创造力,有创造力才有生命力。”

言及中国民族音乐在当下所面临的挑战,赵聪认为,更缺作品。不过她也发现,越来越多的年轻作曲家成长了、自信了。“现在,越来越多的中国作曲家认为,必须要写一部民族作品,才能构建起自己完整的音乐世界。有了好的作品,中国民族音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”